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书笔记

2017100624 国际政治经济学 黄灿灿

作者让我印象深刻的第一个部分是对认同的讨论。第一章中一句在行文中显得有些突兀的话充分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能了解我们是谁。**”我这样来理解这句话：当群体之间出现了“他者”，“他者”所带来的与“自我”的差异，让“自我”特征显现，从而产生了自我身份的确定与群体认同。

如此来看，“认同”自其产生便伴随着对立和排斥，而“他者”越多，认同便越发精确而强烈，而异己感、对立感便愈发强烈。那么问题便出现了，我们需要仔细审视一个习以为常的观点，即文明的沟通 and 了解将带来理解和接纳。如此看来，具有差异的文明越接触，二者之间的差异便越明确，对立便越明显，人们对自身文明便越认同，对异己文明便越对立越排斥。

在第九章“伊斯兰与西方”部分中作者阐述了加剧伊斯兰教与西方间冲突的因素，其中便包含着这个逻辑，如“当伊斯兰复兴运动使穆斯林将其文明和价值观相比较之时，对它们的独特性与重要性重新建立了信心”、“穆斯林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和混居日益扩大，激发了他们各自新的认同感，并认识到他们有何不同，对各自的民族特性以及不同于他人之处有了新的认识。”

如果我们赞同作者对“认同”所做的注解，赞同其定义中所内涵的逻辑的话，那么我们将面对这样的结论：具有根本差异、不相容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解的，甚至是难以缓和的。

作者的论证为我揭开了“认同”与“文明交流”的另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要马上接受这个观点，仍需保持质疑，并细细思考和讨论：文明之间的交流意味

着什么？文明之间的隔阂是否真的无法消解？具有根本差异和不相容的文明又当如何定义（即程度问题）？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和审视现存的文明？其特征？其相容性？是否存在超越价值、文明、意识形态等的绝对利益？

作者让我印象深刻的第二个部分在于其在“上帝的报复”中对现代化与宗教关系的论述。首先我赞同 20 世纪上半叶中，知识精英对于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导致宗教衰亡的假定。所以作者对于现代化的反思和关注，对理性社会的警惕，对现代化为人们所带来的精神创伤的关注，让我振奋。正如作者所言“人们不能只靠理性活着。”我们需要弄清楚“我们是谁？”，即身份界定和认同构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人们或者可以成为哲学家，不断追问追寻答案。很明显这是一条艰辛而人迹罕至的路。而宗教则不同，其提供了权威、可轻松获取的答案。不仅如此，其还为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被打散、被原子化的人们提供了社会群体。宗教解决了由现代化所带来的后遗症，是“对现代化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和异化状态的反应”。现代化使人民对情感的需要和认同的追寻成为必然，当然我们可能会经历物质至上、利益至上的“充实而忙碌”的阶段，但最终我们都会走向这个必然。

那么，如果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如中国，又当如何呢（我不认为中国的宗教信仰是儒教）？政府试图用意识形态的加强来补充，但在现阶段的中国似乎只能满足当局的政治统治需要，而在满足人们的心理、感情和社会创伤上显得毫无助益。因而基于个人心理感受和对世界片面的认识的角度，我认为如今的意识形态宣传无法将分散的社会聚拢。现在的我们是分散化的，缺乏认同的，精神中空的。甚至我想偏激地认为，经历过文革的洗礼，我们的文化也中空了。所以在读此书的一段时间内，我一直被“当下的中国文明是什么？”

这个问题所困扰。

在此部分的最后，作者所指出的非西方社会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是精辟的，即“我们将是现代的，但我们不会是你们”。那么问题便来了，现在的“我们”是什么？

最后，作者有些论述是我不能认同的。如“信任度”问题，作者指出国家会更不信任与其文明不同的国家，但我认为其忽略了另外一些更重要的因素，如国家的“声誉”。以及在第十一章中，其将文明作为了国家介入断层线战争的唯一分析变量，这样的分析显然是单薄的。我理解作者极力突出文明因素重要性的企图，但其对其他现实因素的忽略让我有些难以接受其在这一部分的分析框架。

我敬佩作者在此书中所展现出的敏锐的时代感知力，其让我充分认识到了文明冲突、民族主义和权力争夺这三者相结合将爆发的危险力量，伊斯兰文明的危险性，以及文明因素的重要意义。